

# 狄更斯的伦敦与老舍的北京

## ——谈跨文化文学接受对老舍小说题材选择的影响\*

田建平

(吉首大学公共外语部,湖南吉首 416000)

**摘要:**文学接受是影响文学创作活动的重要因素之一。老舍小说题材的选择深受英国现实主义大师狄更斯的影响。狄更斯和老舍分别把创作定格在自己所熟悉的城市——伦敦和北京,并把下层市民作为自己的创作对象,反映现实黑暗,揭露社会问题,并加以批判、抨击。

**关键词:**跨文化文学接受;文学影响;题材选择

**中图分类号:** I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074(2007)06-0071-04

**作者简介:**田建平(1974-),女,湖南攸县人,吉首大学公共外语部讲师。

根据文艺创作的美学原理,审美是文学艺术创作活动得以发生和进行的前提之一。<sup>[1](P36)</sup>因此,人们就有“凡作家或诗人都是前人或他人作品的接受者”<sup>[2](P85)</sup>的说法。这也意味着文学接受是影响文学创作活动的重要因素之一。古今中外的作家大多有从前人作品中获得启示的经验。例如,对于世界级文学大师托尔斯泰在这方面的经验,苏联心理学家尼季伏洛娃曾作过如此描述:“阅读别人的文艺作品,在托尔斯泰的构思形成中起着重要而特殊的作用。这是他考虑和确立作品的具体形式的直接推动力和基础。”<sup>[3](P164)</sup>茅盾在《谈我的研究》中谈到自己写小说:“我觉得我开始写小说时的凭借还是以前读过的一些外国小说。”<sup>[4](P26)</sup>叶圣陶对所受的外国影响讲得非常具体:“如果不读英文,不接触那些用英文写的文学作品,我决不会写什么小说。”<sup>[5](P194)</sup>曾经有人断言,“凡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影响、有成就的作家,没有哪一个没有受到外国进步文学影响的”<sup>[6](P217)</sup>。对于中国新文学大

师老舍来说,这种情况更为明显。老舍对于跨文化文学接受在激发自己的创作冲动方面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也总是念念不忘,多次提及。在《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中老舍曾说道:“二十七岁出国。为学英文,所以念小说,可是还没想起来写作。到异乡的新鲜劲儿渐渐消失,半年后开始感觉寂寞,也就常常想家。从十四岁就不住在家里,此处所谓‘想家’实在是想在国内所知道的一切。那些事既都是过去的,想起来便像一些图画,大概那色彩不甚浓厚的根本就想不起来了。这些图画常在心中来往,每每在读小说的时候使我忘了读的是什么,而呆呆的忆及自己的过去。小说中是些图画,记忆中也是些图画,为什么不可以把自己的图画用文字画下来呢?我想拿笔了。”<sup>[7](P22)</sup>老舍从出生到二十七岁出国,除了1922年9月到1923年2月到天津任教外,几乎都是呆在北京。所以所谓的想家就是想北京的一切,记忆中的图画也就是关于北京的图画了。为学英文而念的小说虽然很多,但真正激

\* 收稿日期:2007-10-14

发老舍拿笔冲动的莫过于狄更斯了。眼睛看到的是狄更斯描写的伦敦,脑子里浮现的是北京的画面。这样就调动起了他最为熟悉的经验记忆、知识记忆和情感记忆。这些被激活的因素,为他的释放创作潜能,充分发挥文学才华创造了条件。老舍和狄更斯在艰难困苦的都市生活中,接触的大多是都市中的阴暗面,看到的都是当时社会生活中关于政治、法律、教育、婚姻、债务等方面的问题。老舍很快被狄更斯所吸引,反映现实黑暗,揭露社会问题,并加以批判、抨击,便成了他们共同的选择。

狄更斯被认为是典型的伦敦佬,他与伦敦融为一体。狄更斯把毕生的精力都用在对外伦敦的观察上,在伦敦的大街小巷中行走成为他体验城市,洞察人性的方式。他的足迹遍布伦敦的大街小巷,繁华的商业金融中心、肮脏破败的贫民窟偏僻荒凉的郊外、混乱不堪的城乡结合部、积满淤泥的河滨、机关办公楼、律师事务所、监狱、地窖、坟场墓地……,无处不留下狄更斯的足迹,无处不激起狄更斯的想象。“他常常接连几个小时伫立在街头,或者探头窥视阴沉沉的庭院,或者凝神注视阴暗发臭的小巷里的居民。”<sup>[8](P16)</sup>狄更斯洞悉这个城市的底细,他为自己熟知这个城市的大街小巷、阁楼地窖、货栈码头而深感自豪。他在一封书信中写道:“我是多么惦记街道啊,街道仿佛给予我大脑工作时不能缺少的某种东西。在偏僻的地方,我可以好好地写上一两个星期,之后,在伦敦呆上一天,我就可以再次上阵,重新迅速地拿起笔来。但是如果我没有这盏魔灯,日复一日地劳累和写作,那是非常可怕的。”<sup>[8](P12)</sup>

19世纪的伦敦是庞大但仍然扩张着的城市,与其说吸引着狄更斯的是那些象征繁荣和秩序的方面,倒不如说是那些伴随着城市的急遽变化而带来的使人神经错乱的生活和令人目眩的疯狂的伦敦景象。狄更斯对这一切充满了矛盾,他在作品中抨击这种混乱,但在内心却离不开它们。正如弗兰茨·梅林所说:“当他远离伦敦外出度假或旅行时,常常因听不到街上的噪音而抱怨”,“这种噪音对他的创作是必不可少的”。<sup>[9](P94)</sup>大都市的狂乱风景强烈地刺激着狄更斯,冲击着他的感受力。玛格丽特·德拉布尔说,狄更斯“身上有某种东西使他喜欢无序胜过有序。混乱本身对他有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sup>[9](P93)</sup>菲力普·柯林斯指出:“狄更斯最早的伦敦体验来自童年时贫民区的经历,特别是他10岁时在伦敦的那个著名的‘七街口’所看到的这座大

都市的狂野景象。伦敦的这种狂野景象——罪恶、贫穷、乞丐、混乱会激起他的一种快感,对于他来说,没有比这更有意味。狄更斯的想象、语言、技巧都是由这些令人憎恶的、反感的、滑稽的、怪异的事物所激起的,它们最大限度地激发了他的审美倾向,而正义、仁慈、善良则是他给这个纷乱阴暗的城市投入的一线阳光。”<sup>[10](P10)</sup>狄更斯在早期的随笔《七街口》中描写了伦敦无与伦比的纷乱:不规则的广场辐射出七条街道混乱而无序,粗俗肮脏、成群结队在酒店里喝酒的醉鬼,站在路中间吵架的妇女,衣不蔽体的乞丐等等。伦敦生活的繁忙、混乱、粗俗、无所事事以及大都市特有的大杂烩特色形成的奇特风光,对于狄更斯来说既可怕又眩目,既令他恐怖又令他亢奋,最能激起创作的灵感和冲动。正如作者所说:“七街口,多少人在这里迸发出生平第一次赋诗作曲的热情,多少人临终时还将它挂在嘴边……。”<sup>[11](P69)</sup>

就像伦敦对于狄更斯一样,北京对于老舍也是一个梦想。老舍与北京是一个人与一座城、一种文化的关系。北京是老舍的写作源泉。据舒乙统计,老舍作品中提及的240多个北京的山名、水名、胡同名、店铺名,有95%以上的是真实的。老舍作品中这些真实的地名是他生活最真切的记忆,它“为老舍的作品增添了强烈的真实感、立体感和亲切感。”<sup>[12](P152)</sup>老舍生在北京,长在北京,一生67年中有42年在北京度过,最后在北京去世。北京在老舍心中不仅是生活的永恒的记忆,而且是他生命中永远的梦想和追求。对老舍来说,北京不仅是真实描写的现实生活,而且寄予了无比的热爱和无限的遐想。老舍笔下的北京人和北京城,看起来是那么真切、那么实在,但字里行间却透露出浓烈的主观情感,充溢着深厚的理想。老舍是最善客观写实的“作家”,同时又是最富于情感和理想的抒情家。北京在老舍笔下超越了社会地域与风俗人情的记忆层面,而成为一种永恒的梦想,升华为一种崇高的境界。

在老舍笔下,北京是具体的,更是完整的,是现实的,更是理想的。老舍多次充满深情地说道:“我生在北平,那里的人、事、风景、味道和卖酸梅汤、杏儿茶的吆喝的声音,我全都熟悉。一闭眼我的北平就完整地像一张颜色鲜明的图画,浮立在我的心中。我敢放胆地描画它,它是条清溪,我每一探手,就摸上条活泼泼的鱼儿来。”<sup>[7](P573-574)</sup>北京完全融入到老舍的血液之中。老舍在《想北平》一文中说:

“我真爱北平，这个爱几乎是要说而说不出。我爱我的母亲。怎样爱？我说不出。”“我所爱的北平不是枝枝叶叶的一些什么，而是整个儿与我的心灵相粘合的一段历史，一大块地方，多少风景名胜，从雨后的什刹海的蜻蜓一直到我梦里的玉泉山的塔影，都积凑到一块，每一小的事件中有个我，我的每一个思念中有个北平，这只有说不出而已。”北平“它是在我的血里，我的性格和脾气里有许多地方是古城赐给的。我不能爱上海和天津，因为我心中有个北平。”<sup>[13] (P8)</sup>

狄更斯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小职员家庭。在他12岁的时候，父亲不幸负债入狱，生活陷入贫困无着之中。于是幼小的狄更斯被迫去一家皮鞋油作坊当学徒。在几年悲惨的学徒生活中，他饱尝了挨饿、受冻、殴打等种种痛苦和屈辱。也正是在这里，狄更斯接触和了解了社会底层最穷苦的人们，对他们的贫困生活和身心所遭受的凌辱有了切身的感受，从而对他们产生了极大的同情，而对富人、对统治阶级则开始怀有强烈的愤慨。同时也逐渐认识到当时为穷孩子创办的学校和孤儿院之类的资本主义社会所谓慈善事业的虚伪本质。不久由于家庭生活的转机，他相继在律师事务所和报社工作。由于工作需要，狄更斯在伦敦的大街小巷串来串去，从而洞悉了这个他即将描写的世界，为日后的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狄更斯运用丰富的生活积淀，以普通人的生活经历为中心构思情节，塑造描写典型人物典型环境，透过情节揭示社会问题，从而突出主题，引起读者的关注、同情乃至愤慨和憎恨。其小说取材广泛，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描写的就是普通的日常生活，普通的商人、市民、手工艺者、律师、地主、仆人等。在他的创作中，广泛描写了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社会及其精神面貌，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并以一种他特有的社会关怀和正义情感，展开了对当时盛行的功利主义哲学和“现金交易关系”的道德批判。或许可以这样说，正是现实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的有机融合，使狄更斯在英国文学史上占据着一个独特而崇高的地位。

社会经历同样是影响老舍审美心态的基本原因。他熟悉北平风土人情和中下层市民乃至三教九流的心理状态。老舍在谈论自己的创作时也总是喜欢同时提及时代、家庭和自己的生活阅历。老舍出生在一个普通的满族护军之家，家境贫寒。因为贫穷，所以入世早，对事看得真切。家庭出身及

生活阅历深深地影响了他的创作取向，包括一开始就倾心幽默的选择。老舍“认识到了自己擅长幽默的秉赋，并将艺术视角的选择确定在自己最熟悉的北京，”<sup>[14] (337-338)</sup>把北京的下层市民如人力车夫、商人、孤儿、职员、平民等作为自己的写作重点。

老舍喜欢写和善于描写低层市民的性格和命运。老舍把自己的注意力牢牢地盯在那些普普通通的市民的生活上，从容不迫、有滋有味地描绘城市低层市民的悲欢离合。他描写的是城市市民在特定社会中那种悲苦无告的生活遭遇及命运、他们的优点及自鸣得意的优越、他们的愚昧及闭塞等。像《二马》里的老马，在伦敦街上行走，极讲究中国的礼节，见人就低头哈腰，甚至一群英国小孩跟在他后面骂他“老黄脸”、“挨打的货”。他也无动于衷，毫无羞辱感。他讲“面子”，却丢尽了人格国格，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是老舍将东方文化中的市民形象移到西方文化环境里显现出的荒唐、愚蠢和可笑。《老张的哲学》里的赵姑母、赵姑夫，《牛天赐传》里的牛老者、牛太太，《离婚》中的张大哥、老李等。他们都是长期生活在北平这块古文化地域上的市民，带有浓重封建色彩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心理，形成了循规守矩、柔弱、忍让的文化心理特点。老舍是用幽默的口气述说他们，正如他在《我怎样写〈二马〉》中所说：“幽默宽恕了他们，正如宽恕了马家父子，把褊狭与浮浅消解在笑声中，万幸！”<sup>[7] (P533)</sup>老舍笔下另有一部分市民，他们的思想逐渐“洋化”，但他们并没有接受西方文化里进步的东西，而是专门去做形式上的模仿派或恶劣性上的吸取。这派人物的“洋化”，首先表现在婚姻观念、行为方式上特意模仿西方。像《赵子曰》中的欧阳天风，他摧残了纯真姑娘王灵石的爱情，在她离开他以后仍纠缠不休；他污蔑王灵石与张教授有不正当的关系，企图使姑娘蒙受耻辱，而张教授以前在物质上还帮助过他。欧阳天风这种市民，实际上灵魂已被扭曲，丧尽天良，禽兽不如。其次，表现为处处奉行“钱本位”的人生哲学和极端利己主义的处世态度。欧阳天风认为：“金钱是恋爱场中的柱顶石，没钱而想讲爱情，和没有眼睛想看花儿一样无望”。为了金钱，他们不惜牺牲朋友，可以六亲不认，这充分暴露了他们不知廉耻、道德沦丧的本质。虽然这种行为与半殖民地化的社会极端合拍，但也充分反映出人性被泯灭的一面。最后表现在对西方“个性解放”、“自由恋爱”的盲目推崇。《月牙儿》中的女主人公，她不愿意走妈妈的老路，她要“自由

恋爱”、“自力更生”，结果却为生活所迫，不得不走妈妈出卖肉体的老路，残酷的现实扼杀了幼稚的“新思潮”，女儿最终向母亲“最大的理想”靠拢了。对于这些，老舍鲜明的反思、批判的态度。这并不意味着他对西方文化有什么偏见，事实上，这是老舍根据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现状和在这种环境下市民的文化心理作出的评判。

像民族文化、家族伦理、国民性这些深奥的东西，在老舍的小说中永远是小人物的理想，显得是那样的朴素、自然、实在、平易近人。同时，“社会理想”也包含了老舍的美学风格，老舍有着社会的正义感，有着幽默的语言，在他的嘲讽中，我们常常含着热泪。但同时我们不难看出老舍对中华民族某些负面性格的无限忧虑，对民族振奋的热切期盼。

在老舍对北京市民的刻画与描写中，一方面显示出了他的小说深受西方文学观念和小说技法、文体等多方面的影响，另一方面他又以世界意识为立足点，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物，对中国文化进行了独有见地的反思。可以说他的创作是在跨文化接受基础上独辟蹊径的文学实验，具有超民族超国家的文化意蕴。老舍小说创作艺术的形成与发展与英国现实主义大师狄更斯的影响有密切关系，老舍不少创作自述显示出在他创作初期，对秉性、家境、社会阶层都与自己较为接近的狄更斯情有独钟，狄更斯深刻、犀利的社会批判、“行善和爱”的人道主义、超群绝伦妙趣横生的幽默手法最先在老舍心中撞出文学创作的火花。这种跨文化文学接受反映了老舍以开放性认知风格，立足中国，放眼世界，不断同社会化所形成的各种陈规和偏见搏斗，大胆突破传统中的种种规范，广取新的经验与信息，树立新的文学观念，不断摸索新的形式、风格、主题和技

巧，将自己所亲身感受到的生活，以富于艺术感染力的形式表达出来。

#### 参考文献:

- [1] 杜书瀛. 文艺创作美学纲要[M]. 沈阳: 辽宁大学出版社, 1985.
- [2] 李春青. 文学价值学引论[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5.
- [3] [苏] H·尼季伏洛娃. 文艺创作心理学[M]. 魏庆安译,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4.
- [4] 茅盾. 茅盾论创作[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0.
- [5] 叶圣陶. 叶圣陶论创作[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2.
- [6] 刘诚言. 老舍幽默论[M]. 南宁: 广西民族出版社, 1989.
- [7] 曾广灿, 吴怀斌编. 老舍研究资料[C]. 北京: 十月文艺出版社, 1985.
- [8] Margaret Drabble. A Writer's Britain: Landscape in Literature [M].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Ltd. 1979.
- [9] 弗兰茨·梅林. 查尔斯·狄更斯[A]. 罗经国编选. 狄更斯评论集[C].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1.
- [10] Philip Collins. Dickens and the City, in William Sharp and Leonard Wallock. Visions of the Modern City; Essays in History, Art and Literature. [M] The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7.
- [11] 狄更斯. 七街口[A]. 石定乐译. 狄更斯短篇小说选[M].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1994.
- [12] 舒乙. 老舍作品中的北京城[A]. 老舍研究论文集[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3.
- [13] 老舍. 想北平[A]. 老舍全集: 第14卷[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9.
- [14] 陈震文, 石兴泽. 老舍创作论[M]. 沈阳: 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0.

(责任编辑: 粟世来)

## Dickens' London and Lao She's Beijing

—On the Influence of Multi-cultural Literary Reception on Lao She's Choice of Theme

TIAN Jian-ping

(College English Department, Jishou University, Jishou, Hunan 416000, China)

**Abstract:** Literary reception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factors that influence literary composing. Foreign literary has a great impact on Lao She's writing and that's multi-cultural literary reception. Charles Dickens — the great realist had a deep influence on Lao She's choice of theme. Lao She also chose common residents of Beijing as his main objects of writing just like Dickens' writing about the ordinary people in London. Both of the two reflected the corruption of reality, exposed social problems and then criticized those phenomenon.

**Key words:** multi-cultural literary reception; literary influence; choice of theme